

“金石”家话

夏书章 汪淑钧 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广州·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金石”家话 汪淑钧著 援—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12

陈序苑京藏 刘京生京藏 王树元京藏

I ① 夏... ② 汪... III ① 夏书章—回忆录 ② 汪淑钧—回忆录 IV ① 回忆录—中国—现代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23456 号

责任编辑：施国胜
封面设计：欧阳健
责任校对：郭声
责任技编：黄少伟
出版发行：中山大学出版社
编辑部电话 (020) 84111111 84111112
发行部电话 (020) 84111113 84111114
地 址：广州市新港西路 113 号
邮 编：510275
传 真：(020) 84111115
印 刷 者：南海系列印刷公司
经 销 者：广东新华发行集团
规 格：185mm×260mm 1/16 32 印张 1 插页 1 千字
版 次：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寄回出版社调换

目 录

“‘金石’家话”题解.....	(员)	目 录
有“缘”千里来相会	(愿)	
山城巧遇.....	(愿)	
志同道合.....	(愿)	
“政治”姻缘	(愿)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愿)	
贫贱夫妻乐相知	(猿)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猿)	
生儿育女	(源)	
患难见真情	(远)	
“干校”日月.....	(愿)	
“文革”余波.....	(怨)	
重见天日.....	(员)	

共同访美..... (员)

回归“二人世界”..... (员)

圆 □ “金石”家话

目
录

家庭生活记趣	(员园)
我们是“江湖人”	(员园)
开门辟邪	(员园)
苦中作乐	(员园)
大吃黄瓜	(员园)
大买花生米	(员园)
电影广场的变迁	(员园)
“三房隐士”	(员园)
背带的妙用	(员园)
婴儿车的新“功能”	(员园)
孩子们学琴记	(员园)
代乳粉之“功”	(员园)
养猫记	(员园)
捕鼠记	(员园)
打蛇记	(员园)
搬家记	(员园)
夏戒烟记	(员园)
孩子们的趣事	(员园)
我们的人生态度	(员园)
尽其在我，笑面人生	(员园)
乐在有为不求闻	(员园)
“物物而不物于物”	(员园)

人贵自爱自重自强	(155)
顺乎自然，乐天知命	(156)
不迷信，不盲从，不丧志	(159)
“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	(159)
后记	(160)

“‘金石’家话”题解

我们是于 1957年 10月 10日在重庆结婚的，到现在已超过 50年了。时下流行仿照西方习俗的说法，把结婚满了 50年叫做“金婚”，满了 60年叫做“钻石婚”。我们早已过了“金婚”之年，现在又过了“钻石婚”之年。由于时间有如白驹过隙，想起 50年来共同度过的日日夜夜，几乎已恍如隔世，但我们对这段风雨同舟、甘苦与共的艰辛历程，仍然记忆犹新，觉得有不少值得怀念和回味的事情，不妨把它们追记成书，留作纪念。

我们在纪念“金婚”时，没有想起这样做，只是随便照了一张合影，就算“庆祝”了。因此，现在就以“‘金石’家话”为题，把二者结合起来，追述一些记忆犹新和还没有完全淡忘了的往事。习惯上都把结婚叫做“成家”，所以我们就以“家话”为题，来讲些成家前后的旧话。至于“金石”二

字，当然就是指的“金婚”和“钻石婚”。

我们给“金石”二字加上了引号，是为了提起注意，避免误解，因为汉语里有不少含有这两个字的词组，其中的“金石”二字的涵义是和我们所用的完全不同的。例如，“金石良言”是用“金石”表示一些规劝人们的话语不仅有益，而且极为中肯和珍贵；“金石之交”是用“金石”比喻彼此的友情极为坚贞、稳固；“金石为开”则是借以比喻意志坚强，能够克服一切艰难险阻。此外还有“金石丝竹”、“金石之功”等词组中的“金石”二字，更是各有不同的涵义。不过，我们使用这两个字，也有借以表示我们的感情是像金石一样坚固的意思。另外，“金石”二字若不加引号，还可能被误解为研究古文物或石刻的“金石家”讲的话。

而所谓“家话”的内容，只是分条记述我们成家前后的一些生活经历和感受，既不是想以之作为什么“佳话”，也不是要自述什么“家史”或者撰写什么“自传”，以至要把所有的经历事无巨细地写出一本流水账来。更不是想搞“研究”，探讨有关婚姻与家庭的问题。而是仅以“拉家常”的方式，回叙一些感受极深，以致难以忘怀的旧事，重新体会一下以往的一些遭遇，算是为了庆幸我们在

耄耋之年还能够躬逢太平盛世，得以安度余生而抒怀吧。

我们已是 80 多岁，有了两个曾外孙女的老人了。在过 80 岁生日的时候，夏的工作单位和我们的子女曾分别为我们编写出版了两本纪念文集，一为《学者风范 学子楷模——祝贺夏书章教授 80 华诞暨从教 50 周年》（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5 年出版），一为《贤母 良师 益友——祝贺汪淑钧教授 80 大寿暨从事外语教学翻译 50 年》（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5 年出版）。在这两本文集里，我们的子女和一些友好，也提到过我们的不少往事，但都未能比较深入地反映我们的一些切身的体会和感受。所以，我们打算重新回顾一下这段长达半个多世纪，历经坎坷与磨难，始终如一地共同奋斗的人生经历，纵情倾诉一下我们对人生的吉凶祸福的一些体会和感悟。

我们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从中学时代起，就曾亲眼见到国民党反动政府统治下的种种丑恶的社会现象。如尊富欺贫，歧视妇女，容许鸦片馆、赌场、妓院及其他色情场所公开害人，还有崇洋媚外，残酷杀害抗日救亡的革命志士等，都是令稍有良心的中国人也深恶痛绝的可耻行径。在八

年抗日战争时期，由于蒋介石听任日寇肆意践踏我们的国土，我们还饱尝过辗转逃难和在敌机狂轰滥炸时没日没夜地长时间困在防空洞里的滋味。在四川重庆上大学和教书时，又见到过美国兵耀武扬威地开着吉普车，在大街上横冲直撞和凌辱妇女的恶行。

所以，我们对解放后人民政府清扫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的许多革命举措，无不拍手称快。我们的几个孩子，都是在新社会长大的。他们除了在“十年动乱”期中尝过一点“家难”之苦外，从未经过大风大浪的考验，从求学到工作，以至成家后的生活，都可以说是很不错的。因此，我们还希望他们能细心领会我们所讲的“家话”，从而加深对我们的一些经历和我们对生活的态度与追求的理解，并能对人生的苦乐与祸福的缘由，有所启迪和感悟，不管今后遇到什么风浪或困厄，都不会由于“身在福中不知福”，而产生妄念，或者由于迷失了方向而有误入歧途的危险。

不过，要讲“家话”，由于时间相当长，并曾多次迁移，经历的事情太多，平时又没有写日记，以致回忆起过去的遭遇来，有不少情况已经有点淡忘了。而说到没有写日记，如今看来倒是一件“好

事”，因为在那场“横扫”一切的浩劫中，若有日记，不仅难以保存，而且很可能会被“抄”去当作“罪该万死”的“铁证”。

但尽管如此，现在回首前尘，仍有不少情况记忆犹新，一想起来，就会像“过电影”似地历历如在眼前。这些印象十分深刻的往事，是时间所冲淡和磨灭不了的。特别是有些遭遇，如大学毕业后因求职无门而不得不一起改行去教英语，解放前由于工作不稳定而辗转迁移，生活一度贫困艰辛，夏留学归国后依然求职不易和汪的几度失业，以及解放后在“十年动乱”期中遭到飞来横祸，无端蒙冤受屈等等，无一不是永远也忘不了的。如今到了迟暮之年，能够在和平的环境里静下心来，尽情漫谈一些值得回忆的生活经历，再次体味一下人生的灾祸与幸福，应该可以说是一桩意味深长的乐事。至少我们自己是这样想的，不然就不会戴起老花镜来伏案奋笔直书了。

细说起来，我们能成为夫妻，既不是由于“一见钟情”而匆忙结合的，也不是经“媒妁之言”的撮合或者奉“父母之命”随便成婚的，而是通过相识、相知、相爱，有了真挚的感情，顺乎自然地结为终身伴侣的。因此，要讲“家话”，还需要先讲

讲这桩姻缘的来龙去脉，才能理解我们是怎样走到了一起，并能同舟共济，白首偕老的前因后果和具体的历程。

说到婚姻大事，我们还都有过一段几乎沦为包办婚姻的受害者的“逸事”。原来夏在五六岁时，家里就给他定了一门亲事，对方是一个药店老板的女儿。可是夏从未见过她，长大后就坚决反对这种封建的包办婚姻。他在离家上中学时，自己写了一篇依据法律不承认这桩婚事的“声明”，印发给家人和一些亲友。这一在当时可以说是惊世骇俗的“抗婚”举动，曾令他的家人和亲友十分诧异。巧的是，汪的父亲也是在她才五六岁时，就打算给她定亲，只是由于她的母亲坚决反对才作罢。否则作为一个旧社会的女孩子，她恐怕很难像夏那样抗婚成功，从而逃脱包办婚姻的磨难。

1937年时，抗日战争已进入第三年，我们的家乡都已被日寇占领。不愿当亡国奴的青年学生，如有机会，就去投奔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没有这样的机会，便只好到国民党统治区去继续求学或者参加工作。我们当时的情况是只能争取在内地继续求学的机会，所以就都报名参加当年内地的大学统一的招生考试。结果竟被录取到同一所大学

的同一院系，使我们就此走上了同一条道路。因此，我们的“家话”就要从有“缘”来相会讲起。

有“缘”千里来相会

山城巧遇

俗话有云：“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还说：“千里姻缘一线牵。”除去迷信观念和神秘意味，所谓“缘”，其实就是合适的机会或机遇。两个人得以相逢，并能“结亲”，虽然并非如迷信的人所说的，都是“命中注定的”，故只能说是“有缘”，但实际上是必须先有“相逢”的机会，然后才有可能相识，相知，相爱，以至成婚。所以，这可以说是一种巧合，而我们得以在山城相遇，也确实有许多巧合之处。

我们的这番“巧遇”，真是说来话长，因为是由许多偶然的因素促成的。首先，夏是江苏人，汪

是湖北人，在上大学前，素未谋面。夏在家乡高邮县（今高邮市）送驾桥（今送桥镇）上完初小后，就到高邮县城去进高小，后来又扬州上初中，到南京上高中，直到抗战初期在江苏省临时高中毕业，都没有出过省境（当时作为“首都”的南京虽然是与省级平行的直辖市，但地理上仍在江苏省境内）。汪则从家乡应城县（今应城市）的汪家山到武汉去上学后，一直在那里读到高中二年级，也从未出过省境。1937年武汉沦陷前夕，她随学校南迁，到广西全县（今全州）读完了高三。当日寇逼近广西，全县常遭敌机轰炸时，她还曾随学校迁到离全县县城约有百余里的内建乡去上课。后来又随学校迁往云南的镇南。她已毕业，就和全班同学留在昆明报考大学。这时夏则在上海准备考大学，两个人相去何止千里之遥，哪里会想到后来的“巧遇”呢？

我们是于同年高中毕业的，因为家乡都已经沦陷，所以只能就近在设有考点的城市参加统一的高考。夏是从江苏临时高中所在地的兴化，通过敌寇占领区转道去上海报考的。当时上海已成为只剩下小块“租界”还没有沦陷的“孤岛”，周围全是日寇的地盘。汪则是在昆明报考的。当时报考大学，

可以填写三个志愿，并且可以选报不同的学校和院系。我们虽然是同时报考的，但若所报的志愿，包括学校、院系，以及第一、第二和第三个志愿都不相同，或者即使相同，若不能都被录取，也就不可能在山城相遇了。

巧就巧在我们竟不约而同地都以第一志愿所报的原国立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法学院政治学系被录取了。当时中央大学已由南京迁到四川的山城重庆，所以，我们是分别从相去很远的上海和昆明两地，克服当时的交通困难，赶到重庆去入学的。那时我们的实际行程（不是空中的直线距离），真是何止千里，简直可以说是“万里来相会”了。

若说是有什么“缘分”的话，还确实有一些十分巧合的情况。

先说我们能同时高中毕业，得以同时参加高考这一点，就是很巧的。夏比汪年长将近两岁，按一般或正常的情况，他应该比汪早两年读完高中，怎么会有和她同年高中毕业的事呢？原来夏由于早年失怙，家道中落，从小学毕业后，上初中时交学杂费已很勉强，后来就因经济困难而辍学两年，只能呆在家里一面继续自学，一面到本地的初级小学去兼点课或者给哪个请假的教师代一下课，获得一些

极为微薄的报酬，那时他才满 15 岁。后来有个在南京当印刷工人的表哥来信说，他所在的印刷厂急需一个校对员，叫 15 岁的夏赶快去谋得这个工作。不料夏因筹措旅费，迟去了几天，等他赶到南京时，那个校对员的空缺已被别人捷足先登了。一时使他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若想回去，已没有路费了，而要留在南京，生活又成问题。也算是天无绝人之路，先是看到有一家报纸的副刊举办征文，他就写了一篇《我的家乡》去投稿，想不到竟被评为第三名，得到了十元奖金。这真令他喜出望外，因为十块钱在当时可以解决两个多月的吃饭问题哩。接着又遇到了一个同乡的老同学，正在南京一中读师范科，他建议夏去报考一中。夏就怀着不妨试试的心情，毅然以同等学力报考该校的高中。又是一个想不到，不仅考取了，而且因为成绩优异，受到校长的重视，知道他曾因经济困难而辍学，就不但让他免交学杂费，还介绍他到夜校去兼课，每个月挣十块钱作生活费。他就是这样靠半工半读上完了高中，才得以于 1937 年和汪同时高中毕业的。

再说汪，她在 1935 年放暑假时，曾和几个同学去参加冼星海在汉口组织的一个“海星歌咏队”，准备到前线去宣传抗日救国。后来由夏之秋组织的

“武汉合唱团”准备自费到南洋一带去宣传抗日救国时，又邀请她去任钢琴伴奏。她正在犹豫，不知道该去哪一边的时候，听说她就读的学校要迁到广西去继续上课，她不愿失去继续求学的机会，便决定随校南迁，到广西去念完高中。如果她由于另有想法，走上了另一条道路，也就不可能和夏同时于1937年高中毕业，又同时报考大学。

再就我们得以同校、同院、同系，并成为同班同学这一点来说，也是很巧的。为什么报考时两个人填写的第一志愿是同一所大学，又都选读同一门学科呢？毕业后为什么又会一起改行到同一所中学去教英语呢？这些就留到后面去一一细说。

有
缘
『
千
里
来
相
会

志 同 道 合

我们虽然是同时报考大学的，但一个是在已成为“孤岛”的上海，一个是在远处边陲的昆明，两个考区毫无联系，两个人事前又不相识，自然无从商量，怎么会不约而同地选报了中央大学的政治学系，而且都是第一志愿呢？这就要从头说起了。

先说汪，她是在昆明和同班毕业的同学一起报